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四十九辑（总第一四九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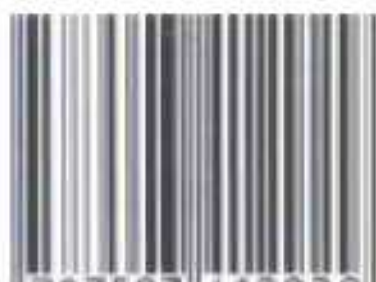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ISBN 7-5034-1292-5



9 787503 412929 >

ISBN 7-5034-1292-5/K · 0884 定价: 13.00 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九辑（总第一四九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49 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11

ISBN 7-5034-1292-5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635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华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5 字数: 195 千字

印 数: 35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 任 朱作霖

副主任 刘 恕 刘济民 李东海 吴 福 宋 堃

金开诚 金冲及 龚育之 张文惠 (常务)

委 员 王庆成 王晓秋 王楚光 刘景录 李汉秋

陈 威 陈 砾 陈漱渝 周秉德 弥松颐

傅璇琮 舒 乙 党德信 马 威 胡太春

俞兴茂 霍明光

本辑执行编委 张文惠 俞兴茂

本辑执行编辑 张燕妮

目 录

青年忆旧

我的求学和外交生涯	王家楨 (1)
我在北京总统府 12 年的见闻	陶树德 (21)
南洋流亡记	徐安如 (42)

证券保险

上海证券业的初期情况	俞莱山 (71)
重庆证券交易所的兴亡	卢瀾康 (76)
从事保险业 30 年经历记	许良灏 (87)

交通邮政

在旧中国南、北交通部的见闻	张梓林 (105)
东北铁路十年回忆	卢景贵 (116)
外资在甘肃开办的邮政局	毓 运 (138)
1926 年传真电报在京津开业记	夏沧一 (143)

人物述林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叶恭绰的财政任务	叶子刚 (145)
------------------------	-------------

爱国老人刘国钧	施宪章 (149)
忆父亲王柏龄	王德模 (173)
夏之时策动龙泉驿起义前后	廖士元 (181)
熊克武被关押在虎门前后	钟子勋 (191)

艺海生涯

我与父亲的昆曲生涯	张小楼 (203)
-----------------	-----------

我的求学和外交生涯

王家楨*

1912年春，我已念了五年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到《书经》、《诗经》都念完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先生给讲过书中的意义。此时我已经15岁了，不知将来干什么，心里很苦闷。正在此时，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劝我到吉林去报考中学。我说服了父母，便到吉林去报考。到了吉林省城，我才体会到，一个乡下孩子既未上过小学，也未见过学堂是什么样子，就来上中学，谈何容易！当时中学是四年制，只有一个省立第一中学，还有一个师范学校。这两个学校我都没能考上，只有插班入箐华中学。这个学校原是八旗学堂，民国元年才改为中学，专收八旗子弟，全部是公费。我托在箐华中学教书的远房亲戚帮忙，求他让我进中学学习。等了两个多月，到了4月中旬，箐华中学才批准我入学插班上课。一进学校，我就惊喜万分，因学校不仅发制服，还发纸张笔墨，上下课、起床、就寝都有定时，不同于私塾。可是到了真正上课时，我就茫然若失了。因为学校开有我从没有学过的课程，如数学，并已经学到代数了，而我连阿拉伯数字还没见过；英文文法也学到了第二册，而我是第一次知道英语这种语言；至于物理、化学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学校还是比

* 作者曾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等职。

较重视国文、历史、地理一类的东西。自我入校以来就勤勉地学习，上课不漏一句话，不懂就请教同学。两个多月后，期末考试时，我名列全班 58 人中的倒数第二。自第二学年起，我的学习成绩就名列全班第二三名了。第三学年，箐华中学并入吉林省立第二中学，原箐华中学两班 120 来个学生只剩下 80 来人。第四学年又被并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第八班，教员全是北京高师毕业的。所以，我这三年半的中学是比较好的。到 1916 年 6 月，我从吉林省第一中学毕业。

1917 年春节过后，我又到吉林省城找原箐华中学校长，告诉他我想上大学，但家里穷供不起。他告诉我，只要你能去北京考大学，每年可领 240 元公费（还是那笔旗款）。于是，我于 1917 年 3 月到了北京，先报名交费上了中国大学，准备暑假时再报考北京大学。入夏后的一天，街上忽然人群慌乱，号外满天飞。我从人群中抢到一张号外，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张勋把溥仪扶上台搞复辟了。一天凌晨，忽然炮声大作，日出后炮声更烈，炮弹的爆炸声离我们的公寓越来越近，我和同屋的两个同学都坐在土炕底下不敢乱跑动，直到午后三四点钟炮声才停息。我们三个便到街上想看个究竟。街上已经没有戒严的气氛了，我们就到天安门前去看热闹。在中华门两侧红墙底下全是段祺瑞的兵马，足有万把人。那些兵一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的样子。大约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响了一枪，段祺瑞的队伍一哄而起，马蹄声、子弹上膛声震耳欲聋，一个骑马的大兵用枪托指着我们说：还不快跑！于是，我们沿着中华门前的石板路拼命向南奔跑，出中华门西便门一直跑到绒线胡同一家卖酸梅汤的小铺子，我们三人一气喝下了一桶酸梅汤。第二天，我们三人全病了，但没想到一个同学经中西医医治无效竟然去世了。我们给他父亲打去电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同学的老父亲，千里迢迢从东北赶来后的悲伤情景。

这年暑假，我已考中北京大学法科，但要等 9 月中旬才开

学，我觉得有点不满意。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说我可以去日本留学，在未正式考入规定的日本大学前还可以拿原八旗学堂公费，等考上所规定的日本大学就可以领省公费。于是，我于1917年11月初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留学时期

我是1917年冬天到日本东京的，1919年春考入日本庆应大学。当我到日本东京后不久，因为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缔结了军事合作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镇压俄国革命，中国留学生总会组织了大规模游行，到中国驻日使馆请愿。我们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直抵大使馆正厅。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正厅前接见了我们，并回答领队提出的各种问题，在一个多小时的问答后，他就悄悄溜回房内，把房门紧紧关上了。一些学生高声叫他出来，一些人干脆就用阳伞砸使馆的门窗，顿时，使馆的正门被砸得稀烂。据说，这是留日学生第一次游行示威活动，日本警察也没有干涉。

1920年4月底，留日学生总会开会讨论举办“五七”国耻纪念日活动时，有人针对二十一条中第五条关于旅大租借25年期满延期问题提出应该组织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坚决反对延期。此建议获得大家一致通过。和我同住一公寓的同学胡俊爱国热情很高，要杀死驻日使馆代办庄某。我反对这种做法，劝他：你杀死一个与卖国协定无多大关系的小小代办，与我们的爱国游行有何补益？他当时接受了我的劝告。但到游行那天早晨，我发现他新买了一把二尺多长的庖刀。我问他：“你拿这个干什么？”他愤然地说：“别管我！我决心杀死他！”

这次游行人数最多，队伍约有一二里长。我们从神田区出发，直奔赤坂区的中国大使馆。刚到使馆前，我们的游行队伍就被日本马警拦阻住。于是在使馆门前，日警的马蹄声、学生的喊

叫声混成一片，后边的游行队伍没有后退，一起向前拥挤，日本警察也越来越多，后来就发生了一场大混战，一直打到下午4时才逐渐平静下来。我回到公寓，到晚饭时也没见胡俊回来，打开晚报一看才知道，新闻记者们一直在现场采访混战情况，对被捕人数、双方受伤人数报道得很详细，比我们亲身参加者知道得还全面。有一条报道说：有一顽猛的留学生在与警察搏斗时，手持一把庖刀将警察的手指砍掉一个云云。我一看就知道是胡俊干的，他肯定在被捕者行列了。第二天，我们一面营救被捕者，一面慰问受伤者。经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帮忙，被捕者除胡俊被判刑外，其他人都被释放了。胡俊在狱中被打伤且伤势很重，留学生又进行了抗议示威，同时争取舆论界的支持。约一个月后，胡俊也以缓刑而被释放了。留日学生总会还给胡俊颁发了一枚金牌，以表扬他的爱国精神。这次留日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在留日学生爱国运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没有过这样的规模和这样的激烈程度，更不用说一些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不畏强暴、有进无退地与警察搏斗了六七个钟头，战斗时团结一心，事后也互相慰问，齐心协力地营救被捕者，当时那种纯洁无私、团结对敌的气氛，至今思之，犹觉神往！

1922年春，我被留日学生总会推选为执行委员的头头。按留学生的惯例，每年5月7日都要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在执委们开会商量这年的国耻纪念大会如何搞时，大家一致决定不举行游行活动，只开纪念大会。5月初，日本便衣警察来访问我，问我今年纪念会游不游行。我说不一定，如无特别干扰，我们执委的意见是不举行游行。这个便衣警察一听连连说：好，好，咱们来个君子协定，我们不派一个警察去会场就是了。5月7日，我们在中国青年会开大会时，到会人数很多，会议进行得也很顺利。就在会议就要结束时，忽然从人群中跳出一个广东籍学生，他跳上讲台，慷慨陈辞，没讲几句（因能听懂广东话的人不多）就把自己的手指咬破，写了一份血书。他手提血书号召大家游行示

威，顿时，会场沸腾起来了，一致要求举行示威游行。于是，我们准备了大小旗帜，排好游行队伍就浩浩荡荡出发了。队伍出发不久，数百名日本骑警就拦住我们的去路。那个曾经访问过我的警察对我大声吼道：你们在我们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已容忍你们在屋子里搞，而你也答应我不游行，现在你又失信，岂有此理！我怕出事，一边同他争辩，一边想解决办法，最后达成妥协，即我们派出二三十个代表去使馆，两边的队伍在原地等候，待代表回来后再各自回原单位。这次国耻纪念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自从 1922 年我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头头以来，我的社会活动就多起来了。另外，我还担任吉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东三省商报（在哈尔滨）委我为驻日特派通讯员（月薪 30 日元），中国驻日使馆与横滨总领事馆派我为在日华工利益保护共济会交际员（月给车马费 30 日元）。同时我的功课也很紧，因为学校规定，年考不及格者留级，连续两年留级即开除学籍。为了能按时完成学业，我在 1923 年 5 月 7 日国耻纪念大会前提出辞职，在此次大会上致词后就离开会场，从此再也没有参加学生的爱国活动。

在 日 华 工

1921 年，日本经济在一战后得到很快恢复，各业出现了兴旺景象，所需劳力也在增多，所以从中国浙江等地招募了大批华工到日本，主要做土木粗工。他们都是由日本把头包给中国的工头成批来日本的。到 1922 年，粗略统计约有两三万人之多。这些乡下农民来到日本后，人生地不熟，被日本把头和中国的工头层层剥削，不但工资拿不到，有时连饭都没得吃，甚至常常受朝鲜工人的欺负，被打伤、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华工及其工头都不会讲日语，也不懂普通话，所以使馆招募留日学生总会和东京中国青年会（教会组织）共同组织“日本华工共济会”，由青年会干事王希天主持共济会内部事务，我负责对外交涉事宜。

在共济会，我共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为了工作，我几乎跑遍了全日本。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离东京很远的地方，几十个华工因日本把头不发工资，中国工头来找我去交涉。我到那找到日本把头，问他为何不按期发工资？这个家伙即刻拔出匕首威吓我。我怒斥他持刀威吓人是犯罪行为，他才软了下来，并将积欠的工资如数当面付给中国工头。原来，他用这种野蛮行动吓过其他人，所以才敢在偏僻的地方欺负无知的中国人。还有一次，几个中国工头来找我说，他们的工地有好几百名华工，同时也有比他们更多的朝鲜工人，不知因为什么事两国工人打了群架，中国工人多人被打成重伤，朝鲜工人没有重伤者。但日本警察偏袒朝鲜人，反令中国工人赔偿损失。听后我立即跟他们来到工地，先看了看受伤的工人，有几个确实伤势很重，已被送进医院。我找到该地警察局长，要求他拘捕打人凶手并赔偿损失（包括医疗费），我还很愤慨地警告他：倘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就以外交关系上控。该局长诚惶诚恐地答应一两天内调查清楚，一定照办。我在小旅馆住了两晚，到第三天又去找警察局长。但警察局长没见我，有一值班警察见我，说没事情了，已经圆满解决了，并递给我一查了事书和收据。我一看，全是一些中国工头了事和解书和一份医疗费收据（对于打人凶手及孰是孰非问题一字未提，只是医疗费稍多一点而已）。看后，我很生气，这些中国工头们不和我打招呼就私自了事。回到旅馆，这些工头摆了一桌酒席准备酬谢我。我很气愤，没吃这顿饭就回东京了。

在成立华工共济会初期，我就和日本内务省和警察总监打过招呼，请他们保护华工正当权利，同时王希天又给华工办学习班，轮训各地工头，所以一年来华工受欺、受骗、受辱之事逐渐减少了。到1923年暑假前，距离我毕业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因为我要为几万字的毕业论文多准备些材料，所以我辞去了华工共济会和留日学生总会的职务，专心写毕业论文。

这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了大地震，王希天到浅草区华

工共济会会址去探望华工，被日本宪兵利用戒严时期特别法令将他杀害了。因为王希天为人忠直，勤恳做事，公而忘私，不但朋友们对他十分敬爱，华工们对他尤为尊敬。所以在他死后不久，在他出生地办了一个医院，命名为“长春希天医院”，华工们回国后还在浙江温州为他立了一个纪念碑。

这次大地震后，日本著名共产党员大山一家也被日本警察杀害了，就连他的三四岁的孩子也未被放过。被杀害的朝鲜工人、中国工人就更不计其数。中国政府派外交总长王正廷来日本慰问。奇怪的是在我留学日本期间，驻日使馆和横滨领事馆中没有一个人能说通日本话的官员。我虽然已辞去留日学生总会的职务，但仍被使馆找去帮助王正廷办理慰问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王正廷总长约我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

1924年春季，我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科毕业。回国时，除应领的归国旅费和多发的一个月的公费外，我还积存有共济会的车马费、东三省商报通讯稿费共计3万多现大洋，这在当时对一个学生而言是一笔巨款了。但当我回到双城县我的家乡时，才知道我的家已没落到何种程度，父亲为躲债被困在县城不能回乡下的家，而家里已到无米下锅的地步。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所携带的钱款全部交给了父亲，在家与家人幸福地欢聚了十来天后就准备到北京找工作去了。为了筹集到北京的旅费，我只得到哈尔滨找东三省商报，想写两篇稿子挣点旅费，没想到该报社长叶元宁先生颇为慷慨，送我100元哈大洋，使我顺利成行，从此离开家乡数年之久。

吴佩孚与张作霖

1924年4月，我到北京找王正廷，而王正廷已左迁为对俄交涉督办，想入外交部工作已不可能。所以，王正廷写了一封恳切的介绍信给吴佩孚，让我到吴佩孚处工作。

我持函于5月初到了洛阳晋见吴佩孚，蒙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元帅亲切接见并盛情款待。饭后吴单独和我谈话，吴问我在日本留学学的什么，我说学的是经济学科。吴又问：经济学科是干什么的？我说主要是有关财政、金融、银行等方面的知识。吴哀叹地说：唉，学什么不好，为什么学那些出纸片子坑人的东西呢？我一听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要统一中国的大人物，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怎么统一中国呢？转而吴又恳切地说：好吧，我叫孙丹林和你谈谈，看你能帮我们什么忙。

孙丹林是内阁某部总长^①，也是吴的亲信和同乡。他告诉我说：大帅决定办一个长江兴业银行，资本2000万元，现在正在筹备中。你可先到日本去考察银行业务情况，等筹备就绪后就电召你回来。于是我由天津乘船又一次到了日本。

到日本后，我当即请求使馆介绍我到日本银行见习。因为日本财经界的人士多是庆应出身的，所以我很容易就到公湾银行见习。上班没几个月，我就觉得对于金融情况特别是关于外汇贸易等，在实践中要比在学校学习时明白得多（因为当时的外贸汇兑等业务都是以伦敦为核心计算的，而英国是以12为进算单位，我国则以10为进算单位。所以，国际贸易、汇兑在理论上讲是很复杂的）。

我在银行见习期间，国内奉直战争爆发了，我一方面留心国内战争的情况，一方面留心日本对我国内战的反应。当时日本舆论界多少有些同情吴佩孚，认为他的胜算多一些，但大部分人希望张作霖取胜。战争没结束，我的前途未卜。正在此时，中国驻日使馆张代办找到使馆帮忙。我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推荐我的同学湖北人氏张某去做。事后不到一个月，我回国的幻想破灭了，生活也成了问题，不得已我又到使馆找张代办帮忙。他竟然同意我做使馆特别专员（不在外交部正式编制之内），月薪100日元，职责是每周给政府写一篇报告，代表使馆出席应邀的集

^① 孙丹林于1922年曾任内务部次长、代总长、总长。

会，并在贵族议院和众议院开会时坐在外交席上旁听（我一次也没落过）。在这将近两年的工作中，我了解了日本的社会和政治情况，使我受益不少。因此，每周给政府写的关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的报告，虽然字数不太多，但还得到政府的好评（张代办告诉我的）。

大约在 1926 年早春，我接到国内来信，叫我到汉口报到，说是吴佩孚东山再起，我当即收拾行李直奔汉口。到汉口才知道吴佩孚已组成讨逆军并设讨逆总司令部，内设外交处，我被委任为外交委员，处长为张之潭，据说是北洋派的谋士（我只见过他一次）。被任为外交委员的约有十几个人，其中一半以上是留过学的。和我年龄相仿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宋介，山东人，留美的；另一个姓薛，上海人，也是留美的；我们三人资历很浅，彼此很照顾，关系也很好。

这年夏季，我们随同吴佩孚坐专车到北京，因为吴佩孚和张作霖又联合起来将段祺瑞、冯玉祥的联合政府打倒了。我们到北京东站，人都住在车上，白天有事去城里，晚上一定要回到车上住宿，这样子待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这期间有两件事情令我难忘：一是吴佩孚和张作霖的会见。我第一次见张作霖和张学良，可以说让我非常惊奇，因为张作霖与我想象中的那种赳赳武夫、魁梧大汉形象完全不同，却是一个面貌清秀、文雅书生的样子。这使我对张作霖的看法有所动摇，再加上后来我又在东北做了几年事（前后两次共约四年），虽然我在东北工作时张作霖已不在人世了，但是经过我对国内政治及社会的观察，我对张作霖的评价已与以前显著不同了（除了私人生活以外）。首先，他在东北三省完全统一政令，用人上能礼贤下士，信任文人王永江等人，没有军阀气焰；政治上相对清明，贪污盗窃之风不甚，所以老百姓没有饥寒交迫之感。其次，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建成打通（打虎山——通辽）、吉奉（吉林——奉天）、姚昂（姚南——昂昂溪）等铁路，与日本南满铁路竞争，即所谓平行线交涉问题。在

对外方面，他的民族观念更值得赞扬，就拿中俄协定与奉俄协定两个外交文件比较一下，就可看出张作霖的土外交比段祺瑞的中央政府的外交高明得多。如奉俄协定是当时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很大的胜利，即将东清铁路（从长春至满洲里、从哈尔滨至绥芬河）帝俄的特权（如铁路两侧附属地的行政权、铁路两侧的采矿权、护路驻军权、铁路管理权等等）全部收回，将铁路变为中俄共营的商业企业。再说对日外交，国人都知道张作霖是亲日派，我也是其中一个，既是亲日派，自然会让些利益给日本了。当我帮张学良办对日外交时，我才明白当时日本宣传所谓有几百件悬案不得解决的真相。原来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时，第五条最为严重，有若干项目是亡国的条款，所以举国反对，最后以去掉第五条为条件，袁世凯接受了这一国耻要求（5月7日国耻纪念日）。但是不知从何而来了一个“满蒙除外论”，于是，日本坚持除外论，张作霖坚决反对除外论，这就是几百件悬案所由来也。一直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张作霖谋杀掉，人们才知道张作霖不是一个卖国贼。当然，他毕竟还是一个封建军阀。

另一件事是：吴佩孚在北京东站驻节期间，段祺瑞政府曾召集了一个由各国代表参加的关税会议，想修改不平等的海关税率条约，中外人士都对此会寄予希望。会议开了一段时间当然没有结果，各国代表借段祺瑞政府垮台之机，纷纷准备回国。当时在北京的日本各通讯社和日本各报纸驻北京记者共20来人到火车上采访吴佩孚，我充任翻译。吴身穿白土布短裤褂，脚穿拖鞋，在专车上的客厅里接待记者，客厅中座无虚席。日本记者问吴佩孚：中国受列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特别是海关税率的限制已80余年，现在能得到各国同意派代表来中国开会修改海关税率确实是好事，不幸因政局动荡，各国代表现在要回国，请上将军谈谈如何对策。我将记者的话一字不漏地翻译给吴听。吴听后稍停一下就说：那我们只好派警察将他们都抓回来啦。我一听大吃